

# 亞洲又一個巨人 ——南朝鮮與晚工業化

• 王小強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0年代初，布魯金斯研究所1976年編的《亞洲新巨人——日本經濟的成功》在中國翻譯出版，曾引起廣泛的關注。1989年，阿姆斯特丹教授以類似書名，推出《亞洲又一個巨人——南朝鮮與晚工業化》。在這本實證性的研究著作裏，作者分析南朝鮮的成功，比較日本、台灣、南美等國家的經驗，希圖探索出一條與流行的自由市場理論相對立的「晚工業化」(late industrializing)國家的特殊規律來。

## 一 學習與追趕

晚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是追趕(catching up)；追趕的方法是學

習。這一命題是阿氏這本書全部理論建設的基石。她認為以英國為首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技術發明(invention)為主，因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是勇於創新和投機的企業家(entrepreneur)。以德美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要特點是技術革新，經濟發展的主力則成為善於管理的公司管理者。二十世紀以來，以日本、東亞四小龍以及南美國家為代表的晚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是通過學習國外已有技術實現的，這時，拿工資的工程技術人員發揮了特殊的骨幹作用。

## 二 增長、生產率與技術進步

在一般經濟分析中，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是一種單向的因果關係。對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而言，技術進步完全是

自由市場條件下私人企業賺錢贏利的動力能否結合推動經濟增長的足夠動力是很值得懷疑的。南朝鮮一方面具有大量剩餘勞動力，一方面有條件借外債。通過這兩方面要素大規模地組合，南朝鮮政府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

一個外在變量。換言之，短期經濟景氣的「熱」與「冷」都不能對技術進步發生直接的作用。這在以技術發明和革新為主的時期表現得十分明顯。但在晚工業化進程中，生產率的提高，技術的進步主要不是靠自己的發明與革新，而是靠引進和學習。這時，經濟增長往往同時意味着市場的擴張——可以使新技術的規模效益充分發揮；同時意味着投資的增加——新增投資中挾帶大量引進的新技術；同時意味着加快學習和積累使用新技術的速度——在幹中學。這三個因素使晚工業化進程中的經濟增長不光是數量上的擴張，而且與質量上的提高有了很直接的關係。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單向因果關係，南朝鮮的經驗證明經濟增長可以成為技術進步的原因。在一些簡單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如有市場競爭等），經濟增長可以加快技術進步的速度和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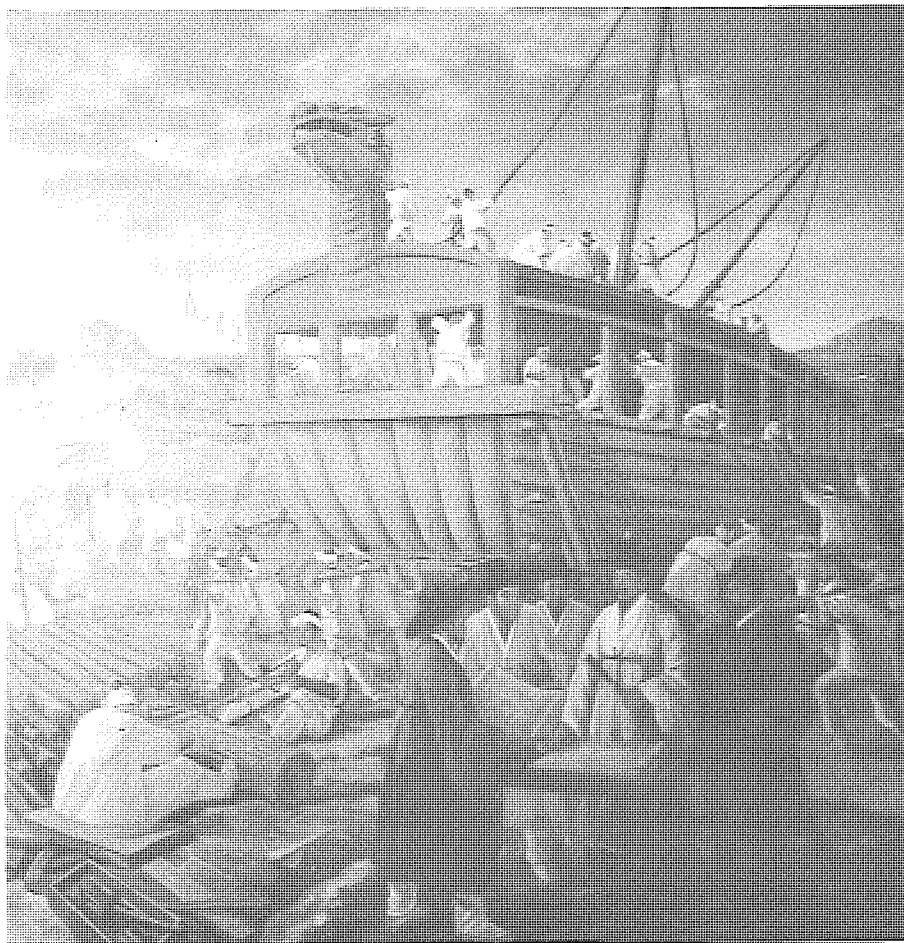
這一反向促進關係的成立，奠定了政府在晚工業化進程中的邏輯地位，至少宏觀景氣政策決策就超出了簡單調控物價與就業的一般意義，具有了保持經濟增長勢頭，以此推動技術進步的特殊意義。自由市場條件下私人企業賺錢贏利的動力能否結合推動經濟增長的足夠動力是很值得懷疑的。南朝鮮一方面具有大量剩餘勞動力，一方面有條件借外債。通過這兩方面要素大規模地組合，南朝鮮政府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南朝鮮曾大舉外債以促長程性投資。1984年外債額為1974年的7倍；但同時由於出口和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相應的大幅度

增長，償債負擔在出口和GNP中所佔的比例只分別由1974年的13.33和3.25上升到1984年的20.75和6.74（頁95）。

### 三 扭曲的價格，正確的方向

阿姆斯特丹在書中曾斷言，包括南朝鮮、日本、台灣在內，所有這些晚工業化國家中的關鍵價格(key prices)都不反映真正的稀缺程度（頁4）。生產率較低的後進國家，一方面需要較低的利率以刺激投資，一方面又需要較高的利率以刺激儲蓄；一方面需要低估本國貨幣以鼓勵出口，一方面又需要高估本國貨幣以降低償債和進口的實際成本。這些相互矛盾的需要是無法通過放任自由的市場同時得到滿足的。相反，恰恰是後進國家經濟發展中這些相互矛盾的需要，需由政府深入的干預和參與來給予滿足。南朝鮮利用政府直接借外債的能力和補貼這兩手，使相對價格大面積地被「扭曲」。在資金方面，與出口相聯繫的跟與引進技術相聯繫的不同價：長程性投資和短期投資不同價；產品方面，銷國內與銷國外不同價；企業方面，出口或長程投資達到一定比例又可在市場銷售上享有種種不同的優惠，如「出口轉內銷」式的來料加工部分免稅內銷等等。這些名目繁多的價格扭曲大面積地造成一物多價。

有意義的是諸多名目繁多的價格扭曲方向卻高度一致：有利於投資和出口。幾乎在整個60和70年



南朝鮮作為晚工業化國家，其經濟發展策略主要不是靠發明和革新，而是靠引進和學習，靠「追趕」。

代，在一些政府鼓勵的行業裏，企業利用外債投資的實際成本經政府補貼後不僅低於國內借貸，而且干脆就是負值(頁74)。而出口面對的實際匯率(經政府補貼後)一直就大大低於官方匯率(頁67)。通過相對價格的扭曲，南朝鮮整個經濟發展被投資和出口所帶動。南朝鮮的投資佔GNP的比例長期在25%以上，80年代前半期一直高於30%，不僅高於日本，甚至高於一般計劃經濟國家(頁75)。80年代出口佔GNP的比例高達35%，也遠高於日本(頁70)。結合前面所述的晚工業化進程中增長與技術進步的關係，南朝鮮所實現的良性循環是投資引進技術，出口擴大市場——發揮新

技術的規模效益，換回外匯——進一步挾帶引進技術的投資。

#### 四 金融與紀律

雖然有美國、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反覆敦促，南朝鮮與台灣一樣，直到80年代，銀行始終是由政府直接經營的。與韋德教授在《駕馭市場》一書中描述的台灣情形相類似，在表面的產品市場層次上南朝鮮政府的干預表現得並不突出，但在要素層次上，特別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金上，始終是只有政府說了算。南朝鮮的股票市場一直處於「垂死」狀態

結合晚工業化進程中增長與技術進步的關係，南朝鮮所實現的良性循環是投資引進技術，出口擴大市場——發揮新技術的規模效益，換回外匯——進一步挾帶引進技術的投資。

南朝鮮開始重工業化的進程恰是鋼鐵、造船這些著名「夕陽」產業在西方急劇蕭條的時期。整個進程幾乎完全是政府決策、參與以致於直接經營(如鋼鐵)的結果。這個結果使南朝鮮在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有了世界最大的製造廠家、技術和一流的管理。

(remained moribund, p. 131)。企業的自有資金率極低，甚至低於日本。直到1983年，其製造業自有資金只有9.9%，絕大部分資金來源於銀行借貸(頁85)。另一方面，整個經濟又集中在少數巨型財團(chaebol)手中，其集中程度甚至高於日本(頁121)。簡言之，經濟高度集中於大型財團，財團自有資金極低，主要資金來源於政府經營的銀行。這樣一種組織結構保證了政府發展戰略的實施；而金融手段的有效性和靈活性，又使政府不用捲入大量的行政手續和討價還價的過程就能自如地實施最有效的干預。大量的價格扭曲實際上多是通過金融手段實現的。

正因為企業離不開政府的幫助，政府才有能力執行紀律來約束企業的行為。而通過金融手段執行的紀律對企業的生存發展，其推動作用顯而易見是強有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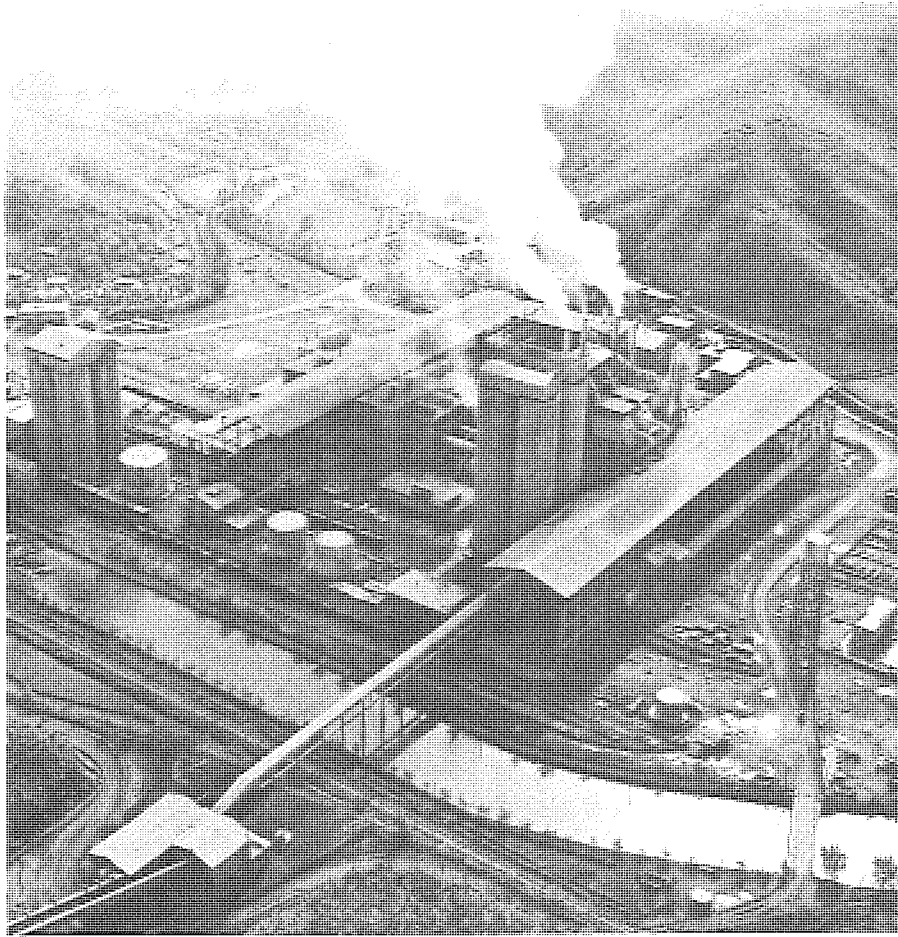
## 五 國家發展戰略與比較優勢

阿氏全書反覆強調了南朝鮮經濟發展的「非線性」。全書重點在於分析南朝鮮的重工業化過程。而這個60、70年代展開的過程，與50年代依托廉價勞動力而繁榮的輕紡工業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經典的比較利益理論所津津樂道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不能解釋南朝鮮在鋼鐵、造船、汽車這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成功。晚工業化國家的落後是在國家整體技術發展水平上的綜合性落後，因而某一專業分工

領域的發展不能解決國家整體技術水平偏低的問題。在列強林立的國際競爭中，若選擇靠市場機制唯利是圖，根本無法與晚工業化國家提高整體技術水平的發展戰略殊途同歸。南朝鮮開始重工業化的進程恰是鋼鐵、造船這些著名「夕陽」產業在西方急劇蕭條的時期。整個重工業化進程，也不是由原輕紡工業向重工業轉移的自然發展過程。原有成功的輕紡企業幾乎無一參與重工業化。整個進程幾乎完全是政府決策、參與以致於直接經營(如鋼鐵)的結果。這個結果使南朝鮮在上述幾個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有了世界最大的製造廠家、技術和一流的管理；使這個高度缺乏自然資源的小國擺脫了依靠廉價勞動力求發展的局面，成為亞洲又一個巨人。

## 六 多樣化經營的大型財團與工程技術人員

南朝鮮經濟發展的骨幹是多樣化經營的大型財團。這些財團有兩個特點：一是相對集中的中央協調；一是沒有專業聯繫的多種經營。像Hyundai財團，從水泥到世界最大的造船廠，到汽車，無所不為。與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這類在某一專業領域發展起來的巨型企業不同，晚工業化國家企業發展的技術來於已有的國外公司。晚工業化國家要想在某一技術領域的深化上，以技術發明和技術革新為主要競爭手段進入國際市場，與那些技術來源國具有長期技術積累的專業化公司競爭，顯然是十分困難



南朝鮮的工業化採用橫向發展的策略，在技術裝備上，具有「非線性」特點，不確定性很大。

的。更何況某一技術的深化往往需要周邊相關技術水平的同步發展，而這恰恰是剛起步的晚工業國家最不具備的條件。所以，以學習、仿製為主的晚工業化國家一時很難在某一專業領域深入或縱向發展。競爭只能首先在降低成本(勞動力便宜)，提高質量，提高服務質量(包括服務的設計改造，如汽車裏多按個把手、鏡子一類的)以及將技術革新轉入產品製造上發揮優勢。所以晚工業化國家的公司發展戰略首先不是在某一專業領域縱向深入，而是擴大地盤式的多種經營，橫向發展。只有橫向拓廣到一定程度，技術革新所需的技術環境才比較完備，技術的縱向深入才有可能。

晚工業化國家的特點是缺少技術積累。橫向拓廣時所涉及的新領域，在技術裝備上，都具有「非線性」特點，不確定性很大。巨型財團相對集中的協調，可以收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效果，明顯有助於增加和加快橫向拓廣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大公司橫向拓廣的發展戰略，與國家提高整體技術水平的發展戰略不期而遇，高度吻合。南朝鮮政府一直在各個需要發揮經濟規模效益的重工業領域限制進入廠商的數量，形成有限競爭的局面，也明顯有助於財團的穩定和成長。

大公司穩定發展的另一個有意思的巧合是有助於工程技術人員發

晚工業化國家的公司發展戰略首先不是在某一專業領域縱向深入，而是擴大地盤式的多種經營，橫向發展。只有橫向拓廣到一定程度，技術革新所需的技術環境才比較完備，技術的縱向深入才有可能。

第一、二次工業革命時期，與西方列強相較，與其說晚工業化國家的市場體系太不健全，倒不如說他們的政府太弱，既無力抵禦外侮，又無力促進本國經濟發展。

揮作用。第一次工業革命與發明相聯繫，企業家的投機冒險活動需要一個急劇變化和不確定性很大的社會環境。經典經濟學對此早已作過結論：風險報酬與不確定性的大小正相關。工程技術人員所需要的社會環境，與樂於投機冒險的企業家所需要的不確定性越大越過癮、風險報酬越高的社會環境顯然大相逕庭。晚工業化的技術任務是學習確定的技術，不主要是創新；有利於工程技術人員學習、消化技術的社會環境，是穩定而確定的等級晉升體系。多樣化經營的巨型財團不僅向工程技術人員不斷提出學習的任務；而且也正是大公司相對穩定的發展和較嚴格的等級晉升體系(hierarchy)，提供了最有利於工程技術人員發揮作用的社會組織環境。

## 七 結語：從學生到先生

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個理論支柱是邊際生產率和比較優勢。邊際生產率要求在自由浮動價格的引導下達到資源配置最優；比較優勢強調通過專業化和分工促進經濟發展。這兩個理論支柱都具有絕對意義上的完美性。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沒有區別地說明問題。阿姆斯特丹從歷史的眼光出發，區別出技術發明、技術革新和學習三種不同的國家發展模式來。從新古典理論出發，自由市場貫徹得越徹底，經濟就自動地發展的越好。從阿氏晚工業化特殊的學習發展模式看，國家(state)、政府卻成了決定性的要

素。至少東亞國家在歷史上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有甚至早有一個相當發達的市場體系(中國更是如此)。即使在第一、二次工業革命時期，與西方列強相較，與其說這些晚工業化國家當時的市場體系太不健全，倒不如說他們的政府太弱，既無力抵禦外侮，又無力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南朝鮮從近代的李王朝到二戰後的民主政府(最多時曾有344個政黨)都有這個問題(第二章)。

阿氏既不同意將東亞新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簡單地歸結為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也不同意將其簡單地歸結為東方文化的特殊因素。她希圖通過南朝鮮重工業化的進程總結出晚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來，用學習的發展模式將東亞一些國家的成功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礎上。在最後一章「從學生到先生」裏，阿氏援引德、美超越英國的歷史經驗預示晚工業化學習模式更進一步的挑戰。

全書資料翔實，論據充分，通俗易懂，可讀性很強，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王小強** 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副理事長。1979年起從事改革政策諮詢研究，現為劍橋大學經濟系博士研究生。獨立和合作發表的論文及調查報告共20餘篇，與白南風合著有《富饒的貧困》，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之一，該書且在英國翻譯出版。